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目　录 IV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意义 2
第二节 文献综述 4
一、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相关研究 5
二、基层网格化治理的相关研究 7
三、“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相关研究 10
四、文献述评 12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13
一、研究方法 13
二、研究思路 15
第四节 创新之处 15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17
第一节 核心概念 17
一、党建引领 17
二、网格治理 18
三、党建引领网格治理 19
第二节 理论基础 19
第三章 W 市农村“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发展历程和运行模式 21
第一节 W 市农村“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发展历程 21
一、自发探索阶段 22
二、局部试点阶段 23
三、全面实行阶段 24
四、深化推广阶段 25
第二节 W 市“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组织架构与作用机理 25
一、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组织架构 25
二、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作用机理 26

第三节 W 市“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模式工作成效 28
一、基本实现农村网格治理全覆盖 28
二、党建引领作用初步发挥 29
三、服务中心工作有力度 29
第四章 W 市“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31
第一节 网格治理目标落实有偏差 31
一、治理事务被“复杂化” 31
二、党建引领功能有待提升 32
第二节 网格治理协同度较低 32
一、治理主体间缺乏统筹 32
二、自治主体参与度较低 34
第三节 网格管理方式不完善 35
一、网格治理存在“行政化”倾向 35
二、监督考核制度不够科学 36
第四节 网格治理能力偏低 37
一、网格员服务意识不足 37
二、网格员服务能力参差不齐 38
三、网格队伍稳定性不足 39
第五章 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模式的优化路径 40
第一节 突出党建功能明确治理目标 41
一、明确网格治理任务 42
二、加强党组织覆盖度 42
第二节 统筹综合推进治理主体协同高效 43
一、发挥村级党组织的作用 43
二、提升自治主体的软实力 44
三、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 44
第三节 打造智治平台实现治理方式数字化 45
一、集成高频常用功能 45
二、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 46
三、建立实时响应机制 47
第四节 完善体制机制落实治理责任 47
一、打造网格责任体系 47
二、优化网格监督考核机制 48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不足 49

第一节 研究的结论 49
第二节 研究的不足 50
参考文献 51
附录 访谈提纲 55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57
致谢 58
浙江师范大学学位论文诚信承诺书 59
浙江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60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60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乡村治、郡县稳”。农村是否善治、稳定，关乎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关乎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关乎国家根基的长治久安。在农村治理实践中，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同时，农村治理工作的复杂程度和工作量不断加大[1]，对农村社会治理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在传统的农村管理模式中，由于基层政府“行政化”、乡村治理“单一化”、村两委“空心化”、农民参与“边缘化”、其他组织“分散化”等问题[2]，导致农村治理体制机制难以构建，影响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战略的推进，是乡村治理中亟待破解的困局。在此背景下，农村借鉴了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创新实施农村网格治理，以求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由于农村与城市在空间特点、事务类型、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作为最初孕生于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网格化治理是否适用于乡村社会，是否存在问题，目前尚未明晰。

从当前对农村网格治理的实践来看，农村网格化治理的模式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如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基层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和分工不清晰，导致基层治理力量分配不平衡，仅靠网格员落实上级的“千条线”，往往难以承接；网格化管理权责不明，部分地区网格员由相关职能部门派驻或转岗而来，部门习惯“点对点”发布命令，致使乡镇街道层面对网格员的统筹调度能力减弱；农村基层筹资渠道有限，工作人员薪资待遇难以保障，致使网格员队伍流动性大、专业性低；多元主体参与不足，通过网格员为纽带难以有效调动政府、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难以实现治理资源

[1]袁方成,王泽. 政社合作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提升路径——以温州市五马街道“大网格”实验为参照[J]. 江汉论坛,2017(10):54-59.

[2]张新文,张国磊.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3):63-71.

的优化、整合、共享。同时农村网格员的年龄普遍偏大、学历偏低、热情不高、信心不足，整个网格团队主动性和创造性较低，影响了基层治理效能。因此，基层探索出以党建为引领的农村网格化治理新模式，通过党建引领统合各方资源、优化组织架构、规范治理手段、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以此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党组织和党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日益凸显，在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通过嵌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治理情境，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功能，以此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1]。无论是从理论、政策或是实践来看，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关于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的研究，是亟待学术界予以系统、深入探讨的学术命题。

因此，笔者选择以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单位 W 市的农村“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模式为案例研究对象，旨在通过观察分析党建引领下的农村网格治理取得了哪些新成效；是否仍然存在问题；如何改进优化，使得城市的网格治理模式在农村得到新的发展。

二、研究意义

社会治理需要根据基层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调整优化。通过对农村党建引领和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底层运作逻辑，从而更好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赋能乡村治理，并构建系统有效的治理举措，推进形成“强化党建引领”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双向互促的良性循环。

（一）理论意义

从理论维度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对“强化党建引领”和“提升乡村治理”相关的理论成果不断涌现，但总的来说，仍落后于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乡村治理实践。当前学者大部分以城市社区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研究对象，而对农村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模式研究相对缺乏。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 90%以上，人口超过 5 亿人，到了 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后，我们依然有约 3 亿人生

[1]潘博.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D].吉林大学,2020.239.

活在农村地区[1]，这一人口规模放在世界上与人口大国相比，依然相当可观，农村作为执政的根基所在，也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同时，从农村的功能来讲，农业是一切产业的基础，可以说，农村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大后方，农村治理成效如何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根基是否牢固。因此，加强对农村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挖掘其底层的运作逻辑，探索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基层治理工作。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党建引领农村治理融合了“党建引领”和“乡村治理”的两个内涵，但从以往的研究来看，部分研究或单纯生硬地以“基层党建工作”代替“党建引领治理”；或仅仅强调党建作用，而其对基层治理有什么作用缺乏论述，致使党建引领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相脱节；或对党建引领泛泛而谈，对于其在基层治理中怎么发挥作用，应该“引领什么、如何引领”缺乏深入分析探讨。换而言之，“党建”与“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如何相互作用，当前的研究还存在理论支撑不足、实践总结不够、缺乏深入等现象。如果抛开农村自身独有的治理逻辑情境，单纯用政党逻辑去压制社会治理问题，反而会削弱党的领导、动摇党的农村根基[2]。在此情况下，学术界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内在逻辑的梳理和具体模式的构建也呈现出集中在对政策的阐释和解读，尚未形成紧贴治理实践、契合治理逻辑的政策体系。

“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模式作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涌现出了大量实践案例和成功经验。鉴于此，本文以 W 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发展历程、主要做法、经验成效进行专业性、系统性研究，为系统全面地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助益。

第二节 现实意义

从党的执政角度来看。农村党组织作为乡镇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是上通下达、下情上通的“最后一公里”。推进农村“党建引领”相关工作，不仅能强化基层政权，也可以大幅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同时，“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是我国农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途径，也是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之治”的生动体现。本文对 W 市农村“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模式进行理论研究，以期加强和完善

[1]刘俊伶,王克,夏侯沁蕊,等. 城镇化背景下中国长期低碳转型路径研究[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0,16(3):355-366.

[2]布成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J].社会科学,2020(06):71-82.

农村党的建设，更好得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农村群众对村党组织、乡镇党委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以及社会治理效率。

从实际工作角度来看。W 市所处的省在全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走在前列，W 市作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单位，经过几年的实践，其体制机制、运行模式、实践经验对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且 W 市的农村治理经验具有可借鉴性，深入研究其运行模式和运行机理，对于深化推广“党建引领网格治理”这一农村治理创新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通过 W 市农村“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案例研究，结合精细化管理理论，从技术和理论层面为基层党委政府深化农村治理提出可操作的路径。通过将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优化农村治理模式，为农村治理工作者提供具体方法，为基层治理提供有效的路径，为基层给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具体思路。同时，在全面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运用“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治理模式，来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并充分体现农村自治，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文献综述

近年来，党建引领推进基层社会网格化治理的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涌现出如“党建引领网格治理”[1]“红色网格”[2]“小社区+大党委”[3]“党建+微网格”[4]“五微共享、五社共治”[5]等基层治理新模式，通过党建引领和网格治理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党和群众的紧密联系，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农村“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模式即包含了“党建引领”，也涉及农村网格化治理，因此本文从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基层网格化治理和党建引领网格治理三方面梳理文献，并对既有研究进行评析。由于国外对于我国“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研究虽然广泛但对本文提出观点的解释性以及可借鉴性不强，另外“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是基于我国国情下的新时代产物，国外对于该方面的研究相对欠缺，且对本文的参考性不大，因此本文综述中对这两方面的

[1]徐嘉. 推进"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深度融合[J]. 人民论坛,2019(11):108-109.

[2]李威利. 党建引领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上海经验[J]. 重庆社会科学,2017(10):34-40.

[3]李涛,王海斌,宋玉营. 党建引领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W 社区“小社区+大党委”治理模式的启示[J]. 广西社会科学,2020,(04):59-65.

[4]周文舜.“党建+微网格”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J]. 新湘评论,2020,(19):38.

[5]向春玲,吴闫,龙昊廷. “五微共享、五联共治”：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以南京建邺区江心洲街道为例[J]. 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37(03):79-87.

阐述主要内容基于国内的前沿研究。

一、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相关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在此背景下，关于农村基层党建的研究与日俱增，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

农村基层党建的基础理论相关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基层党建的内涵与功能，二是农村基层党建的问题与对策。

（一）农村党建的内涵与功能

农村基层党建，即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指出，“乡镇党的委员会和村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全面领导乡镇、村的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1]。条例明确了农村党组织的定义，同时也指出农村党建的内涵，即包括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农村党建兼具鲜明的党性、实践性，能够指导党在不同时期的工作与活动。

就农村基层党建的功能定位而言，学者们认为，农村党建主要包括强化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提升社会基层民主政治以及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功能。

从强化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来看，段刘娇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政治功能是农村基层组织最核心、最本质的功能[2]，该观点表明，农村党组织的本质属性是政治组织，也是基层政权的主要组织形式。吴梅芳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强化并主要承担着八项功能，主要为：领导发展、规划导向、服务群众、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宣传教育、促进和谐、示范引导和吸纳培育输送社会精英等[3]。

从提升社会基层民主政治来看，韩艳认为，农村党组织要顺应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形势，不断加强农村党建，提高治理能力，引导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发挥作用[4]。

[1]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N]. 人民日报,2019-01-11(001).
[2]段刘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重要论述探析[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2,15(6):9-14.
[3]吴梅芳.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J]. 中州学刊,2009(6):28-31.
[4]韩艳.治理主体多元化视角下农村基层党建论析[J].探索,2016(03):106-110.

刘培功认为，基层党组织既是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也充当着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先锋队”的角色，要想彻底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必须不断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1]。吴晓俊、何渭巍指出，部分农村党组织存在职能定位模糊、功能弱化等现象，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通过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从而保障农民享有和依法行驶各项基本政治权益、民主权利，引导农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实现村民自治[2]。

从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来看,张力、庄甲坤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审视农村党建工作，将“组织振兴”视作“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在推动农村发展、服务农民群众、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3]。王瑾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与农村地区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息息相关，是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的有力措施[4]。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建的问题与对策

第一，体制机制的问题和对策。学者们指出，要加快推进农村基层党建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党组织的组织功能、服务功能、引领功能。徐建宇基于上海丁村“巷邻坊”党建服务点的分析，指出基层党委政府以体制性吸纳、党建功能的生活化运作和组织行动的双向嵌入方式，实现将村民自治吸纳到村庄党建中[5]。郭献功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联系群众难、组织群众难、领导群众难的困境，要改变长期采用的行政手段、强迫命令和“一刀切”的做法，以此提升村民行使民主权利、珍惜民主权利、培养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同时要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打通服务网络，促进农村发展[6]。

第二，党员队伍管理的问题和对策。学者们认为，在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党员管理不善、结构不优、能力不强导致的党组织涣散疲软等问题。毕孟琴、姜中

[1]刘培功.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基层党组织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理路与完善路径[J]. 理论探讨,2022(2):28-36.

[2]吴晓俊,何渭巍.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功能及其完善[J]. 江西社会科学,2011,31(6):230-233.

[3]张力,庄甲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1,14(06):102-108.

[4]王瑾.农村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J].福州党校学报,2018(04):46-50.

[5]徐建宇. 村庄党建嵌入村民自治的功能实现机制:一种实践的主张 ——基于上海J村"巷邻坊"党建服务点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5):48-58.

[6]郭献功.创新农村基层党建体制机制的若干思考[J].学习论坛,2011,27(03):18-22.

强指出，农村党员的老化和家族化现象影响了农村人才的储备，要通过培养后备人才，壮大党员队伍，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党员队伍老化、发展党员家族化等问题[1]。王晓斌以上海市南汇区为例，指出农村党组织主要存在党员队伍老化、新生力量缺乏、党员年龄结构失衡、党员缺乏履职平台等问题，需要严把入口、疏通出口“两手抓”，改善农村党员队伍结构，可以采取整合资源、分类施教，优化设置、完善机制，人才反哺、搭建平台等多种方式[2]。

第三，党建作用发挥的问题和对策。学者们普遍认为，要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引领并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冀名峰指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要适应农村农民党员与农民群众权益多元化、分散化以及流动性高等特征，同时要通过网格化管理，引领农村的社会变化[3]。陈运鹏认为，部分农村党组织，忽视了社会突出问题，在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上缺乏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存在，导致矛盾问题持续恶化；应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有效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进一步巩固其政治地位[4]]。

二、基层网格化治理的相关研究

（一）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关于社会治理模式方面，国外多以社区形式开展基层治理，社区治理模式自十九世纪起颇受国外学者关注，且主要关注的方向为“多元社区治理”“社区网格化管理”“网络化治理”等。

美国学者杰克.罗斯曼将社区社会工作实务划分成地区发展、社会计划和社会行动三个模式[5]。地区发展模式：在治理地域中，引导和鼓励居民以自助或互助的方式解决社区内存在的问题；社会计划模式：依靠专家意见，通过专家调研、论证、计划，然后采取行动，解决社区内问题；社会行动模式：社区工作者动员、组织社区居民，采取集体行动，以从下而上施压的形式，以求公正的解决问题。与之不同的是，理查

[1]毕孟琴,姜中强.农村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人民论坛,2010(32):42-43.
[2]王晓斌. 改善农村党员队伍结构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J]. 广西社会科学,2006(11):14-17.
[3]冀名峰.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组织力[J].社会治理,2018(05):16-23.
[4]陈运鹏.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建设方式研究——基于“乐东经验”的调查[J].改革与开放,2017(14):43-45.
[5][美]杰克.罗斯曼,[美]约翰.E.特罗普曼,[译]刘继同. 社区组织的模式和宏观实务的观点：他们的融合与阶段（上）[J]. 社会福利（理论版）,2015(1):38-45,24.

德·C·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实际的美国社区》中提出了公民治理中的公民、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职业者这三种类型，并阐述了三者的功能、地位、相互关系，他认为公民应成为社区的治理者而非消费者，代议者应负责协调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而非替公民进行决策，社区公共服务职业者应该帮助公民实现其社区治理目标,而非控制公共权威[1]。该观点强调了调动公民在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要充分发挥社区的自治作用，而代议者及公共服务职业者则作为治理情境中的补充，进一步服务于基层治理。

关于社区治理实践的研究。关于社区治理的实践和研究，各国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和立场差异较大，根据学者研究现状来看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治理模式和观点：第一种是自治型，具有强烈的民主化特征，比如以美国为典型的欧美、澳洲等国家，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认为政府通过把握大方向开展公共服务，是“掌舵人”，而非直接的“划桨人”[2]，该观点强调社区治理的民主性和自治性。第二种是政府主导型，比如以德国、新加坡为典型的国家，达尔指出，政府与社区行为密切相关，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实现对社区自上而下的管理，进而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强控制和强干预[3]，该模式中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而基层需服从政府的管理和约束；第三类是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以以色列、日本为典型，捷崎初仁等指出政府对社区发展实行主导、规划、提供经费支持等间接性的管理，同时社区居民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服务意识，使得社区的发展同时具备官方与民间两种属性[4]，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是介于自治型和政府主导型之间的一种双向管理模式，是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民间管理组织间的一种相互协作。

第二节 “网格化”治理模式的研究

关于网格化治理模式的研究。我国网格化治理模式首创于2004年的北京市东城区，主要是将城区行政划分为若干个“网格”，“网格”是基于“区—街道—社区”三级管理体系下新增的层级，以此构建成四级责任体系，使得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化[5]。此后，网格化治理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向党的建设、工会、妇联等领域延伸，

[1][美]理查德·C·博克斯. 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326.

[2][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译]周敦仁.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73.

[3][美]达尔，[译]周军华.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M].吉林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192.

[4][日]捷崎初仁，金井利之，伊藤正次. 日本地方自治[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90.

[5]梁玉柱.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调适行动与社会治理的行政化[J]. 社会主义研究,2018(4):105-113.

“网格”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网格化治理也渗透到了农村治理。郑让认为，在“政府治理”和“农村自治”要把握好平衡，实现政府自上而下的高效治理以及村民自下而上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双方面提升，从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功能，促使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形成政府和社会合作共治的新格局[1]。李岩松认为，通过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创建“基层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提升基层公共服务[2]。

关于“网格化治理”，国外主要聚焦“网络化治理”“网格化管理”的研究。戈得史密斯在《网络化治理》中指出，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的主体，网络化更便于对社会治理的管理，政府通过整合和利用资源，加强组织的灵活性和回应性，从而提高决策和执行的质量，增强群众满意度[3]。罗兹教授通过对英国政治中的制度研究途径进行分析和评述，指出网络化治理实现了政府、市场、市民社会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中并存，网络中参与者之间既互相依赖又相互独立[4]。凯科特等人提出网络化治理强调行动者之间相互管理的重要性，各主体间需要通过集体行动实现治理目标，在治理过程中，网络的目标、内部组织都要在一定的规则和规律中进行行动[5]。

第三节 “网格化”治理存在问题

“网格化”治理的本质是：通过对行政区域以网格形式进行划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手段，从而实现管理流程的再造和管理体制的变革，进一步提升公共事务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等关键词多次在重大会议重大报告中被提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治理服务管理平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出“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关于网格化治理体制机制的研究，学者逐渐将其与党建引领、多元共治、联动机制等理念相结合，形成了“网格

[1]郑让. 农村网格化治理创新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6.67.

[2]李岩松.“基层党建+网格化管理”开启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J].党的生活(黑龙江),2021(03):54-55.

[3][美]戈德史密斯，[译]孙迎春. 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3.

[4][英]R. A. W. 罗兹.[译]丁煌、丁方达.理解治理：政策网络、治理、反思与问责[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214.

[5]Walter J.M. Kickert.Public Governance in the Netherlands: An Alternative to Anglo-American ‘Managerial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J］. 1997,75.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95140222211011244